

# 论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在和平解放 西藏进程中的历史贡献

李蓉

(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拉萨 850000)

[关键词]西北局;西北军区;和平解放西藏;贡献

[摘要]解放西藏是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必然抉择,也是西藏百万农奴摆脱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和黑暗腐朽的封建农奴制的必由之路。按照中央解放西藏“以西南为主、西北为辅”的决策部署,担负“第二责任”的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创建了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承担了从西北进军和护送十世班禅入藏的任务,发展和完善了这一时期党的西藏工作基本方针政策,为解放和经营西藏贡献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003(2020)04-0016-08

解放西藏,既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实现和平民主的必由之路,也是她带领西藏各族人民彻底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侵略,走独立自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的既定方针。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伴随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解放和经营西藏的部署由西北局调整为西南局主导,承担“第二责任”的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亦开始在这一时期为推动西藏解放、促进其稳定发展和丰富完善党的西藏工作方针、政策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 一、组建中共西北西藏工作委员会,形成 统一筹划与组织部署西北入藏 的坚强领导核心

1950年1月10日,根据毛泽东主席要求在西藏成立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西南局研究成立了以

张国华任书记、谭冠三任副书记的西藏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中央和中央军委于24日下达的《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中,在批准其成立的同时,依据西北局担负的任务亦提出“西北局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的人可加入此委员会”<sup>[1][12]</sup>,使西北西藏工委的筹建提上了日程。

时任西北军司令、西北局书记的彭德怀和西北军政委、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十分关心、重视西北西藏工委的筹建工作,安排范明具体负责筹建事宜<sup>①</sup>。12月25日,西北局派范明等人到北京汇报请示西北进藏问题。范明抵京后,于1951年1月

<sup>①</sup> 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5卷记载,这一时期范明以西北西藏工委书记身份开展筹建工作;范明也在《护送十世班禅大师返藏纪实》中提到,西北局曾于1950年11月8日、13日两次作具体指示,并任命他为西北西藏工委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又标注范明任西北西藏工委书记的时间是1951年6月至12月,由此推断,西北西藏工委宣布正式成立前,范明已按中央的指示,以工委书记的身份开始了筹建工作。

[收稿日期]2020-04-15

[作者简介]李蓉(1970—),女,重庆开县人,教授,主要从事藏族历史文化、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研究。

10日前,将请求中央明示西北工委的任务、范围和内部组织问题等内容的汇报材料交给了李维汉。30日,李维汉组织西北局来京汇报人员进行了讨论。31日,周恩来总理指示“西藏工委搞二千多人的班子太大”“工委搞1500人”<sup>[2]299—301</sup>。此后,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西北局进藏的决定,并要求从中央直属单位、西北军区和陕西、甘肃、青海、山西等地调配干部,以西北军区联络部为基础组建西北西藏工委。至1951年3月上旬,西北局决定由范明、慕生忠、牙含章、白云峰等4人组成西北西藏工委领导班子。6月7日,西北局组织部下发了《关于西藏工委组成及主要干部配备的通知》,除明确上述人事决定外,还规定工委下设机构包括组织、宣传、民运、总务、统战、卫生、文教等工作部(处),以及工作队、摄影队、报社、文工队、运输队和警卫营等。至此,西北西藏工委在兰州正式组建成立。

按照《关于进军西藏的指示》中已明确的西藏工作最终以西南为主导的指示,中央在批准成立西北西藏工委时,始终谋划着日后两个工委的合并问题(之前分立有利于双方分头准备和部署入藏工作)。周恩来在接见范明等人时就强调指出西北进军前要保持与西南方面的联络,还提到“出发后,第一梯队即归十八军指挥。进藏以后,可能统一归西南局领导。”<sup>[3]</sup>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前,由于西藏问题已明确由西南方面主管,中央正式考虑将两工委合并、形成统一领导,为此,李维汉在5月17日接见汪锋、范明和牙含章时指示,“两工委合并,并‘搞一统一的名单出来报中央。’”<sup>[2]306</sup>12月12日,西南局将西藏工委上报的以张国华、范明、牙含章、谭冠三等11人为成员的名单转报给了中央,中央表示同意。1952年1月10日,西藏工委在拉萨宣布成立,以解放军部队的名义对外称“独立支队”。

西北西藏工委自1950年9月间开始筹建,到次年1月实际已完成筹建工作;直至1952年1月与西藏工委合并前,又独立开展工作近一年时间。按照中央的部署,其主要任务就是准备接管后藏和护送十世班禅返藏<sup>[4]</sup>。为此,西北工委一方面组织筹备并从西北入藏,沿途遵照党的民族理论、方针政策与

“十七条协议”,将开展军事行动与政治宣传紧密结合起来,稳定和凝聚了西北一带的人心,树立了党和人民军队崇高的威望、威信,牢固建立了藏族民众与中央和人民军队的高度信任与亲密感情,奠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在圆满完成护送班禅返藏任务的同时,起到了消融十世班禅与十四世达赖两大集团冰封关系的关键作用,使班禅及其行辕得以顺利返回日喀则开展工作和驻军后藏,争取了后藏民众的人心归属。西北西藏工委并入西藏工委后,原西北西藏工委的成员担负起了新的职责任务,既继续推动了西藏和平解放、实现新的民族大团结的历史进程,又保证了此后西藏在党的领导下走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之路,同时还为这一时期在西藏创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创造性地构建西藏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做出了新贡献。

## 二、派劝和团前往拉萨,宣传中央对西藏问题的主张,形成积极的舆论影响

中国共产党依据以往历次战争中开展统战工作的经验与成效,对解放西藏始终抱着政治劝和的期许;加之历史上历代中央王朝均实施“因俗而治”的治藏方略,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为分裂中国又大力宣传 and 强化西藏“独立”“自主”等思想观念,使当时西藏上层社会将西藏看作是“独立国家”的意识较为浓厚,中央通过政治劝和解决西藏问题不仅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牺牲和减轻西藏社会的震荡,也能更好地团结安抚和稳定西藏农奴主贵族阶层。早在1949年7月,毛泽东就曾有“西藏须用政治方式去解决”的意图<sup>[5]399</sup>。次年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十八军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上同样指出对西藏问题的解决“亦多靠政治”<sup>[6]</sup>;18日,朱德在政务院召开的西藏问题座谈会上亦表示“最好采取政治解决办法”<sup>[7]</sup>。其后,中央在给西南局的电报中称,“要用一切方法和达赖集团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并与我和解’”<sup>[8]68</sup>。5月17日,中央明确指示西南局、西北局,只要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和协助解放军入藏,对西藏原有的政治、宗教制度、武装、风俗习惯和达赖的地位等,既不变更,还要加以保护,并表示,

“只要有利于进军西藏这个前提,在策略上应该使之能够起最大限度的争取作用和分化作用”<sup>[8]77</sup>。直至昌都战役前一个多月(8月),毛泽东仍抱和平之念,提出解放军能在10月份占领昌都,就有可能迫使西藏当局“求得和平解决”<sup>[9]23</sup>。

正是基于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愿景、必要性和可行性,1950年1—7月,中央共派出四次“劝和团”赴藏寻求与达赖集团沟通和解,其中,由西北局负责的有两次。一次是当年1月,派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张竟成等4人,带着青海省政府副主席廖汉生写给达赖和摄政达扎的信,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入藏,此信送达后,西藏当局曾在官员会议上宣读,并作回复,张竟成等人随即被遣送出藏。另一次则派出以达赖长兄当才·土登晋美诺布为团长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简称“青海劝和团”)赴藏,这是一次规模较大、较为引人注目的入藏劝和行动。

3月,在张竟成等人被遣返后,中央同意西南局派志清法师赴藏劝说的同时,指示西北局查访滞留在西北的达赖的哥哥,“调查是否可以派去”<sup>[8]68</sup>。西北局为此选派人员加强了与达赖长兄当才活佛的接触和联系,做其思想工作。5月1日,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和先灵活佛为代表,格勒嘉措为秘书长,青海联络站迟玉锐等4名工作人员组成了“青海劝和团”。7月,“劝和团”从西宁前往拉萨,抵达黑河(那曲)后即遭扣留,三位被送到拉萨的活佛除当才外都被限制行动自由,迟玉锐等人则被软禁在山南泽当,至1951年初西藏当局准备和谈前才得以释放。事实证明,立场反动、心怀叵测的当才活佛不过是将此次西藏之行当作与家人团聚、沆瀣一气,并借机摆脱共产党的机会,所以他在入藏途中总是将营地驻扎在离代表团营地很远的地方,企图把其他成员甩掉<sup>[10]</sup>。与达赖会面后,他对共产党及其政策进行种种歪曲污蔑和反面说教,如“他们不仅是无宗教主义者,事实上也反宗教之道而行”云云,加重了达赖对共产党的疑虑与误解。此次劝和的失败,加之西南方面主动请缨劝和的格达活佛于7月下旬抵达昌都后遇害,使中央最终放弃了这一努力。

“青海劝和团”的活动表面看起来劳而无功,但

这是西北局和西北军区基于以往统战经验的一次大胆、积极的尝试,其实施不仅从政治劝和的途径向世人昭示了中共解放西藏的信心和决心,更重要的是,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平解决”的极大诚意,是其寻求政治解决西藏问题的具体体现。客观上,这一举动起到了在进藏沿途宣传中央的主张和激荡、鼓动人心的作用,是一次成功的“攻心战”。代表团的藏语翻译汪荣德事后曾回忆说,这是“一次不宣传的宣传”“影响很大,当局怎么封锁也封锁不住‘共产’进藏的消息”<sup>[11]</sup>。一些思想顽固落后的西藏上层人士自欺欺人的心理由此也受到了很大冲击,心理防线开始动摇。

### 三、西北入藏,进军阿里,护送班禅返藏, 为和平解放西藏做出重大贡献

团结依靠班禅集团,通过护送班禅返藏、稳定和凝聚后藏人心,是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重大谋略和关键步骤。1949年8月6日,在后来被称为是毛泽东给彭德怀的“解决西藏问题的第一个指示”中,要求尊重和保护班禅,“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sup>[12]</sup>。彭德怀和兼有统战重任的习仲勋遂开始通过中共兰州地下党组织、塔尔寺僧人等与班禅系统联系、沟通。9月间,经西北局的努力,十世班禅彻底打消了疑虑,决定“我们应该投靠共产党”<sup>[13]</sup>,并随青海省政府派来的迎接人员从避居的香日德住进了西宁塔尔寺。此后,西北局更加重视对班禅政治地位和权力的尊重、生命安全的保护和生活的关心照顾,使班禅“心向祖国和共产党”的态度更鲜明,意志更坚决,他先后在新中国成立和西藏噶厦准备派“亲善团”赴国外游说之际致电中央,表明其返藏的愿望、坚决拥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为效忠人民祖国奋斗到底”<sup>[14]</sup>的政治态度与决心。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深知要实现班禅返藏首要问题在于达赖承认班禅的合法地位,并与班禅和解,由是在与噶厦进行的和平解放西藏谈判中,中央不仅促使达赖和噶厦“同意将班禅问题列入协议”<sup>[15]</sup>,还在最终形成的“十七条协议”中,承认班禅的合法地位和职权,为班禅返藏创造了必要条件。

1951年1月,经与堪布会议厅商议,中央指示班禅返藏的领导工作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负责,同时“配合西南军区,准备接收后藏”<sup>[16]</sup>。17日,中央同意西北军区的部署,以青海骑兵支队的800人和少数青海藏族志愿兵为护送班禅的兵力,编入十八军序列<sup>[17]38-39</sup>。2月13日,中央通知西北局,包括警卫部队在内,西北工委和班禅集团各1500人入藏,并配给骡马8000匹<sup>[18]</sup>。27日,范明、牙含章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正、副代表,梁选贤被选派为堪布会议厅副秘书长,配合秘书长拉敏·益西楚臣的工作。4月,驻班禅行辕代表办公室成立。7月,由计晋美和纳旺金巴任正、副主任的行辕入藏工作委员会成立。为使达赖打消顾虑,真心欢迎班禅,中央决定由范明率西北入藏部队以十八军独立支队名义先行入藏,计晋美等行辕代表随行,经与达赖协商妥当后再护送班禅入藏。

8月22日,由范明率领的独立支队,包括西北工委机关、班禅行辕代表在内共计1300余人,在香日德召开成立暨进藏誓师大会,会议宣布范明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慕生忠任副政委(后任政委),计晋美、罗曼中任参谋长。当日下午,由牦牛、骆驼队组成的第一梯队出发。28日,由骡马队组成的第二梯队随即也踏上进藏的征途。独立支队先是翻过了海拔5266米的诺木岗山,接着穿过荒漠、永冻区、黄河源头的沮洳沼泽地带,于9月20日到达长江源头、巴颜喀拉山南麓的通天河畔,经15个昼夜徒涉而过,随即穿越通天河以南人迹罕至的荒原,翻越唐古拉山口,于11月4日到达黑河(那曲),12月1日进抵拉萨。至此,独立支队自出发之日起历经102天,其中行军45天,行程1400余公里,胜利完成了入藏任务。

十八军独立支队进藏后,计晋美代表班禅与达赖集团就“恢复班禅的职权和地位”“归还班禅离藏后被侵占的领地”等达成协议,同时西北西藏工委融入西藏工委,十八军将部分兵力部署在日喀则、江孜等地,为班禅回后藏后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保证。12月19日,班禅在牙含章等人的陪同护送下从西宁启程返藏,习仲勋前来送行。当时,浩浩荡荡的返藏队伍除骡马外,还有骆驼3000峰,牦牛7000多头,绵延十几公里<sup>[19]</sup>,充分反映出中央和西北局对

班禅返藏的重视程度。

1952年4月28日,班禅一行抵达拉萨,在此停留了43天。在范明等人的极力斡旋、协调下,两大政教集团最终握手言和,结束了自十三世达赖喇嘛和九世班禅以来近30年的不睦关系。6月23日,班禅行辕顺利回到日喀则。班禅返藏问题的顺利圆满解决,实现了西藏社会的重新团结,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也由此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西北军区和工委不论是在确保班禅及其行辕安全返藏,还是调处两大政教集团的矛盾、弥合裂痕方面,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与此同时,西北军区开始进军阿里。1950年8月1日,西北军区所辖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第一团一连在团党委代表兼保卫股长李狄三、连长曹海林、副连长彭清云的率领下,从于田县普鲁村出发入藏。该连由汉、维、蒙、回、藏、锡伯、哈萨克等7个民族的135名官兵组成。他们翻越了横亘在南疆与藏北阿里的喀喇昆仑山,于15日进驻阿里改则县的扎芒堡,坚守到1951年5月,才与独立骑兵师第二团副团长安志明带领的两个连和机关人员280余人会合,此时先遣连官兵因病殉职人员多达63人,其中包括李狄三。6月5日后,安志明整合了先遣连,率所部先后进抵普兰县和阿里首府噶大克(今西藏自治区噶尔县),该团贺景福营长率一个连追击从新疆、青海等地逃到阿里的乌斯满土匪,于次月进驻日土宗。1952年2月和10月,由安志明、贺景福为首的阿里骑兵支队和阿里分工委先后成立,担负了驻守和经营阿里的任务。

#### 四、修建青藏公路,为解放西藏、加强国防和推动西藏建设提供坚实保障

康藏、青藏公路的修建对西藏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是广受赞誉的。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就曾认为这是中共在上世纪50年代在西藏“最重要的建树”“无论从经济上或者军事上看,这些公路将成为变革的最伟大的先驱”<sup>[20]</sup>。为使西藏通公路,毛泽东早在1950年4月1日就做出了“边进军,边修路”的指示,1952年4月1日,他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

西藏工作问题的指示》时强调“以待公路修通、生产自给并对藏民物质利益有所改善之后,方能谈得上某些较大的改革”<sup>[17]60</sup>。从1950年1月至年底,西南局数次向中央和军委提议尽快从西北方修通到拉萨的道路。次年1月4日,毛泽东向周恩来、聂荣臻等人征询意见“是否令西北负责修玉树、黑河、拉萨公路?”<sup>[9]38</sup>“十七条协议”签订后的5月25日,中央军委在进军西藏的训令中,明确了西北军区修筑从西宁到玉树、至丁青的公路,以及勘测从敦煌、经柴达木、至拉萨的路线<sup>[1]50-51</sup>。至此,西北局负责修通青藏公路一事最终确定下来。

新青藏公路起自西宁,经香日德、格尔木,止于拉萨,全长2100公里(后经改建全长1948公里),修建时从西宁到倒淌河的105公里沿用了新中国成立前修到玉树的旧青藏线一段;倒淌河经香日德至格尔木701公里,则沿用新中国成立前修建后又废弃的旧青新线路的一段<sup>[21]</sup>,两段公路原只有部分路段可通车。1950年6月,西北局用3个月时间修通了西宁至玉树的公路,1952年已能顺利通车到格尔木,1953年10月,新青藏公路开修后,慕生忠又带领西藏运输总队按旧青新线整修了香日德到格尔木段的公路。1951年8月至1953年初,西北局完成了勘探工作。1953年8月,青藏公路指挥部成立,原西北局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北进藏支队政委慕生忠被任命为青藏公路筑路大队政委,同时调配民工1200多人、干部20多人、10辆大卡车、1500公斤炸药和3000多件工具开始修路。当年10月,慕生忠率领的修路队修通了香日德到格尔木路段,将西北局西藏运输总队的驮运出发点向前推进了300公里。1954年5月11日,在距格尔木30公里、昆仑山下的艾芨里沟,青藏公路格尔木至拉萨段正式破土动工。慕生忠将施工人员按每队200人编成6个工程队,他们先是拿下了雪水河工程,修通了昆仑桥,来到了昆仑山南麓,随后穿越风火山、雁石坪、楚玛尔河,7月30日,修通可可西里的“五道梁”,来到沱沱河边,经过40多天的奋战,于10月20日过唐古拉山,11月11日到黑河,23日修到了羊八井。从羊八井到拉萨,要穿过20公里的石峡,从西北和拉萨派出的两个工兵团赶到石峡两头分别施工,历经

20余天终于将石峡打通,12月15日,公路修到了拉萨,与康藏公路同时通车。这条连通青藏两地的“大动脉”施工用时7个月零4天,耗资3730万元,虽然当时只具备基本通车能力,但却对西藏供给、巩固国防和助推西藏建设意义非凡。

### 五、践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路线方针,丰富和发展党的西藏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

和平解放西藏时期,西北局和西北军区的功勋不仅在于验证了中央关于西藏解放的决策、路线方针和各项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同时还通过实践,积累了党和人民军队解放和经营西藏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西藏工作理论、方针政策。

(一)“慎重稳进”作为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得以践行和发展

中央决策要将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sup>[22]</sup>,但西藏毕竟有着复杂的政治形势、错综纠缠的利益关联和清末以来地方与中央的不正常关系,所以中央对解放和经营西藏采取的是“慎重稳进”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如毛泽东、周恩来就曾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不应操之过急”<sup>[5]380</sup>“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极端谨慎的态度,稳步前进”<sup>[17]60</sup>“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做”<sup>[17]101</sup>“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sup>[23]387</sup>“西藏是实行政教合一,我们要逐步使政教分离”<sup>[2]113</sup>,等等。

西北局、西北军区同西南方面一样,是中央西藏工作的这一方针和原则的践行者和发展者。早在解放战争后期就开始主政西北的军政领导彭德怀、习仲勋等人,鉴于大西北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宗教派别林立的实际情况,在解放和经营大西北中就已审慎稳妥地推进了多项工作,取得了诸多共识,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所以,他们对中央“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和原则不仅领悟深刻,还能丰富和发展其内涵,创造性地开展相关工作。当习仲勋在西宁看望并欢送班禅返藏时,要求班禅行辕官员既要团结噶厦官员,还应时时劝导班禅做事勿急,要先

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他对班禅强调西藏工作要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时说“条件不成熟的不要办,上层爱国人士和领袖人物不同意的事不要办”<sup>[24]</sup>。几天后,他会见牙含章等人,作了《关于做好班禅工作和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第一个要点就是强调做西藏工作“不能犯急性病”“宁可迟办,不可急,不怕慢”,还特别指出,“所谓‘稳进’不是不进,而是多用思想,多考虑应办不应办?办了以后,后果如何”<sup>[25]</sup>。该指示由牙含章带到拉萨后,西藏工委印发传达到各地。1952年1月10日,已接替彭德怀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在致中央的《关于入藏干部应做好民族工作》的电文中,针对进藏部队和西北地区中一些干部急于改革的心理,不但指出做民族工作要防止过急过高要求,同时还有针对性和创见性地提出“内地藏族地区暂不进行土地改革……特别是佛教寺院的土地征收于我不利;在游牧区也不应该提‘反恶霸’口号,半游牧区也不进行土改”。毛泽东批示表示赞同<sup>[17]59</sup>。习仲勋的这一意见显然对于团结对共产党有抵触情绪和处于摇摆不定立场的西藏僧侣贵族有很好的示范和借鉴意义。

依据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对西藏工作的这一方针、原则,西北西藏工委和进藏部队始终以“十七条协议”、入藏守则、纪律等严格约束自己,耐心审慎、稳妥行事。在班禅返藏与达赖初次会见时,针对噶厦妄想以会见礼仪造成班禅对达赖“俯首称臣”的表象的卑劣做法,西藏工委以隐忍克制的态度,建议中央准许两大政教集团自行协商解决。范明等原西北西藏工委人员展开了对班禅和计晋美等人耐心细致、苦口婆心的劝说、安抚工作,消解了他们的怨气,打动班禅站在了宽容大度的立场,让噶厦制造事端和矛盾的打算落了空。这是“慎重稳进”方针在实际运用中所取得的一项重大成果。

(二)使立足区情、团结爱国阶层、依靠民众成为西藏工作的重要策略

旧西藏等级森严,绝大多数民众受藏传佛教思想影响,这对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西藏的总目标形成了很大阻碍。这一现实迫切要求西北局、西北军区立足于实际,灵活机动地制定和运用各种策略、政策,团结、争取西藏上层爱国贵

族僧侣和依靠贫苦民众,孤立和打击少数顽固派、反对派和分裂派。

对于争取和团结达赖、班禅政教势力,彭德怀、习仲勋等西北局领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毛泽东的嘱托,彭德怀多次对范明强调要尊重和保护班禅。寻找到班禅后,彭德怀又向毛泽东提议从其集团内选出代表参加军政委员会的工作<sup>[17]19</sup>,给予了班禅很大的尊重与政治信任。习仲勋曾这样认识团结达赖、班禅等西藏上层的重要意义:“以我们为主体,首先搞好达赖与班禅之间的团结,然后搞民族之间的、宗教的上层和下层、喇嘛和俗人、农民与牧人之间的团结,形成一个爱国反帝的统一战线”<sup>[26]</sup>。为此,他负责接待班禅一行时,不仅在生活上对年少的班禅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政治上也格外注重帮助其成长、成熟,最终两人成为“忘年交”,并终生保持着深厚的情谊。

实践证明,团结西藏爱国的农牧主贵族,依靠广大民众,尊重其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西北部队顺利进藏的重要“法宝”。如范明率领十八军独立支队在出发前就制订了周密的《入藏守则》等文件、条规,对入藏人员进行宣传、教育,要求他们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帮助藏族民众,沿途秋毫无犯。当部队行进到黄河源头沮洳沼泽地带、巴颜喀拉山南麓的曲麻莱县时,县长率千户、百户等头人十人,各部落头人和群众数百人前来欢迎,经过两天的休整,部队顺利走出了被称之为“进去出不来”的曲麻莱。再如,进抵阿里改则县扎麻芒堡的先遣连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能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解放军的严明纪律,不仅积极开展了争取阿里噶本赤门·索朗班觉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还将历经艰险从新疆带来的布匹、粮食等用于救济当地贫苦牧民,赤门·索朗班觉深为感动,遂向先遣连书面提出“西藏人民愿做中央人民政府的老百姓”等5条意见。毛泽东得知后,亲自向索朗班觉复信称他为此感到很高兴,还希望他们用种种方法将中央和解放军的做法散布开去,并“多多抄寄到拉萨方面去”。赤门·索朗班觉后来果真给拉萨当局去信提及先遣连的所作所为,主张西藏当局同中央和谈<sup>[27]</sup>。

毛泽东曾在1952年4月6日作《关于西藏工作

方针的指示》时指出,争取和影响群众,最基本的环节就是要“精打细算”“生产自给”,他还要求进藏部队只做生产、贸易、医药之类的好事<sup>[23]62—63</sup>。西北局和西北军区为确保进藏部队能自给自足、不吃地方,在部队开拔前就抓紧筹措了大批粮食和特需物资,仅驻青海部队就为进藏骑兵支队储备了1年所需的粮秣。西北部队入藏后,西北局组织了长途运输畜力总队,购买骆驼,招收驼工,建立转运站,保证了进藏部队的供应,也正是这支运输队在慕生忠等人的带领下,修通了青藏公路,立下了卓越功勋。

(三)与西南方面共同凝结形成“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是西藏工作重要的精神积淀和动力源泉

西藏地处高寒偏远的边疆,落后的社会经济和异常严峻的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给入藏军队和人员带来了极大的身心和个人意志挑战,党的西藏工作应以怎样的精神面貌推进、各项方针政策应以怎样的意志和决心贯彻执行?西北进藏部队、运输队和筑路队以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和英雄浪漫主义情怀给予完美回答。范明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长时间行进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其间穿过荒漠、永冻地带,跨过黄河源头的沮洳沼泽区、通天河,翻越唐古拉山,历经千辛万苦来到拉萨。入藏后被中央军委、西北军区授予“进藏英雄先遣连”称号的官兵历经15天九死一生、艰苦卓绝的行军,跋涉1300里雪域绝地来到阿里境内后,又在海拔4500米的阿里改则县驻守了270多个日夜,全连各族官兵在冰天雪地里饱受极度缺氧、饥饿、严寒、伤病的巨大威胁,以伤病牺牲过半人数的代价等来了后援部队,连王震将军在给先遣连请功的报告中都赞赏地写道:“独立骑兵师进藏先遣连,自进入藏北地区之后,经历了长征以来最大之苦难,表现出最高的英雄主义之概”。慕生忠所率领的西北运输总队则在极其简陋粗糙的设备、工具和微薄、有限的粮食等物质供给下,日夜兼程,顶风冒雪,战天斗地,舍生忘死,一步步将公路修到了拉萨。他们所修筑的青藏公路是目前世界上里程最长的高原公路,这条路大部分在海拔四五千千米的大草原上,跨过了长江上游通天河的楚玛尔河、穆鲁乌苏河、乌兰木伦河、穆迭乌苏河等4大支流和其他25条河流,越过日月山、昆仑山、

唐古拉山等15座大山,由青海的香日德蜿蜒盘旋至西藏北部折向东南再进入拉萨西部,创造了世界公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西北解放和经营西藏的各支队伍与西南入藏队伍一道磨练了顽强意志,锻炼和提高了适应高原环境的能力,培养了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作风,共同缔造了“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这些精神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西藏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党的光荣传统包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精神的继承发展,又是和平解放西藏时期党的西藏工作凝结形成的巨大精神财富,是继续深入开展西藏工作的不竭动力源泉,同时它们还极大丰富和充实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从而始终激励着全国和西藏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前赴后继,不断创造出新的辉煌业绩!

####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 [2]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周恩来与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 [3]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三十周年专辑[G].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190.
- [4]江村罗布.辉煌的二十世纪新中国大纪录·西藏卷(1949—1999)[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9:625.
- [5]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M].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
- [6]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66)[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0:3.
- [7]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10.
- [8]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平解放西藏[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

- [10]迟玉锐. 回顾随西藏劝和团进藏[G]//西藏革命回忆录:第3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15.
- [11]汪荣德讲述,赵清阳记录. 跟随夏日仓活佛进藏记[J]. 中国西藏,1998(2).
-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20.
- [13]张云,王维强,周炜,黄维忠. 从灵童到领袖——历代班禅密传[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180.
- [14]班禅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反对拉萨反动当局叛离祖国[N].人民日报,1950-02-07.
- [15]乐于泓. 回忆投身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G]//中共党史资料:第32辑.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55.
- [16]牙含章. 护送班禅额尔德尼返回西藏的回忆[G]//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192.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 [18]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25.
- [19]刘伟. 十一世班禅坐床记[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77.
- [20][加拿大]谭·戈伦夫. 现代西藏的诞生[M].伍昆明,王宝玉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177—178.
- [21]邓郁清. 回忆修筑青藏公路[G]//纪念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第2卷·筑路篇(下).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210.
- [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
-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24]范民新. 忆习仲勋与第十世班禅的友谊[G]//习仲勋纪念文集.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567.
- [25]习仲勋. 习仲勋文集:上卷[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265.
- [26]习仲勋. 习仲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200.
- [27]郭冠忠. 关于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研究[J]. 西藏研究,1997(1).

## A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North – west Bureau and North – west Military Command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in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Li 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China)

**Keywords:** North – west Bureau; North – west Military Command; Peaceful Liberation of Tibet; Contribution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united peaceful and democratic new China to help millions of Tibetan serfs to get rid of Anglo – American imperialist forces and feudal serfdom it is necessary to liberate Tibet. According to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ployment strategy ‘Take South – west Military Command as the Dominate Force, North – west Military as the Subsidiary Force’, North – west Bureau and North – west Military Command established North – west Tibet working committee, carried out the mission of marching towards Tibet from North – west and escorting the Tenth Panchen Lama enter Tibet, set up and developed CPC’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Tibet affai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se principles has accumulated rich an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for the lib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ibet.

[责任编辑:李国锋]

[责任校对:王雷]